

目 录
CONTENTS

编者按:2018年全国两会已经结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体现的改革力度很大,“改革”一词出现97次,创历年之最。报告中指出: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重要契机,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政府工作报告对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健全生态文明体制等做出了具体的部署。

对改革动向的关注,对改革效果的期待,正构成这个时代多数人的共同意识与集体自觉。今年两会议程,改革是引人注目的重头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序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提速降费、个税改革等举措引发热议,一项项关乎国家发展、民生冷暖的改革方案,是当代中国在新征程上不断迸发活力的源泉,也是政府自信的高度彰显。

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很清楚,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是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这个机缘也很自然的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再出发。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成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关键枢纽所在。无论是完善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消除金融、财税等领域风险隐患,还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都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期推出“关键领域改革”专题,深入梳理和分析在养老、医疗、教育、税收等领域,国家政府正在推进或者将要开展的各项改革措施,希望为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关键领域改革

- 02 国家治理大变革,加速迈进深水区
- 05 社保改革:养老和医疗改革再啃“硬骨头”
- 07 教育改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仍需攻坚克难
- 09 税制改革:关于房地产税的三个关键问题

政坛经纬

- 11 国务院机构改革:一场前所未有的整合

经济纵横

- 14 中美贸易摩擦的“面子和里子”

文化漫步

- 16 “崭崭头角露峥嵘”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历史深处

- 18 毛泽东当年如何主导中美关系进程

悦读时光

- 封三 李文:我的老爸李敖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戈建虎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国家治理大变革，加速迈进深水区

2018年全国“两会”已经结束。稍微留意的人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次两会，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从去年党的十九大，到这次全国“两会”，最高领导层将又一次完成新老交替，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已经到来。严格来说，这个政治周期从党的十八大就开始了。过去五年，这个政治周期的逻辑逐渐展开，到了今天已经清晰可见。借助于此次全国“两会”，我们也已经可以基本看清楚未来政经大势的走向。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突破口

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很清楚，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改革开放。2018年是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这个机缘也很自然的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再出发。

再出发，从哪里出发？或者说，今天改革开放事业的突破口在哪里？答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说今天政治新周期的逻辑的展开，从社会各界的角度来说，就是和国家治理发生碰撞和磨合的过程。过去五年，有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五年治国理政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党的十九大和全国“两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改革部署开始落地。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亟待解决的是封闭半封闭下的落后状态。面对意识形态教条和体制弊端的羁绊，改革开放是从局部开始突破的，局部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持续扩大着开放和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还有一条线索，即国家治理。只不过，过去的市场化和国家治理的碰撞，是以宏观调控、反腐败、政府机构改革、内外资所得税统一、劳动法等具体议题的形式展开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很多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跌宕起伏，其背后都是与这些具体议题的碰撞，比如调控经济过热、以产权问题表现出来的企业家与地方的矛盾、腐败小集团的瓦解等等。产权、宏观调控、政商关系可以说是解读过去倒掉的企业家命运的三个关键词。

如果说过去在红和黑之间有广大的灰色地带——这并不难理解，局部突破必然意味着暂时性的“违

法”状态(不管这个“法”是指法律条文还是意识形态教条),那么,今天的治理现代化就是要缩小灰色地带。灰色意味着没有稳定和持久的预期,今天我们常说的过去积累起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样灰色地带的存在。这正如一个企业,发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样子,而发展起来之后,要真正成为一流企业,就需要规范化一样。

而在今天,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是一项主动进行顶层设计、有着全盘计划并由最高层推动执行的整体方略,并成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一大突破口,这有很深刻的时代原因。

读懂新时代的治国理政

过去五年治国理政的实践,其实正是围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理论上是一种精炼的概括,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问题”。首先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判断是,其中固然有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如果不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面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一直迟疑和等待,不会丧失窗口期的宝贵机遇,而且还会耗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资源。

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过去五年工作回顾部分,出现了这样的重要论断: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重大结构性变革,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



构性变革。而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中国经济的这个重大结构性变革,是中国的开放和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深化的重大进展。新动能的快速崛起,给国家治理尤其是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比如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等,都对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对过去五年治国理政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治理现代化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原因在于用治理来保证发展进程不被打断,更在于它成了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关键枢纽所在。

现代化治理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治理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对当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治理可以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治理变革不是修修补补,而必须上升到“现代化”的高度。那么,到底怎样才是现代化的治理?

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到全国“两会”所要决定的修宪和其他重大改革事项,我们可以更具体的理解现代化治理的内涵。这些重大改革事项,很多是社会各界议论已久的议题,如今终于开始破冰。从回应的社会重大关切,也可以看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关切,意味着一种敏感度。比如从企业家角度来说,对产权保护就是高度敏感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与过去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权不清(比如红帽子企业)不同的是,今天的产权保护更多的是法治化的营商

环境。即使产权归属是明晰的,但由于产权交易和纠纷法治化水平不高,产权遭受侵犯的现象仍然比较多。这在国家治理上就必然要求划清正常的法律要求和实际上的侵夺型干预之间的界限。正如刘鹤在参加山西代表团讨论时说的,“营商环境关键是在透明法治下保护好产权,保护产权必须充分,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小打小闹的事儿都可以再说,但根本的事儿一定要做到。”

产权保护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一部分。事实上,无论何种重大社会关切,我们几乎都可以相应地看到由于治理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营商环境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敏感度比较直接,比如办照办证、吃拿卡要、税费负担等等。《政府工作报告》有很多具体举措,包括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照后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大幅缩短商标注册周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再压减一半;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 8000 多亿元,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 3000 多亿元,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的坚决降下来,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等等。

制度性交易成本集中体现但绝不局限于营商环境。相对于这些,司法公平、合理税制、金融监管、破除市场的隐形壁垒、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等,更触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在新的政治周期下,司法体制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等,都已经或者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冲着问题去的,与问题针锋相对,但又不是局限于问题,而是从突出问题入手,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定型这个宏大历史命题。就是说,现在的治理大变革,是着眼于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配套的成熟和定型的制度体系。从过去五年的实践和正在推进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出这套制度体系的基本逻辑是既能够有效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又能有效减少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更能维护高质量经济体系的健康。

这些重大改革都还在进行当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本轮机构改革是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基础。最重要的还有治理的规则的确定,这方面既有处于空白的情况,又有存在缺陷的情况。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社会重大关切的多样化,本身就意味着现代化治理实际上是一种有执政党统一领导下的多元化治理。那么,规则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执政党统一领导下的多元化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这也是 2018 年全国“两会”开启新的政治周期之后的重要看点。

从改革开放 40 年尤其是过去五年的实践可以看出,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公权力的过强,会妨碍市场和社会的发育;公权力过弱,往往又会导致社会经济灰色化甚至黑化的后果。如何把握好这个平衡,以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变革,推动现代化治理规则的建立健全,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2018 年第 6 期 南风窗)



社保改革：养老和医疗改革再啃“硬骨头”

在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中，养老和医疗改革是民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2018年，作为二次分配的社保政策性待遇水平仍将稳步提高。在此基础上，还将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提高医疗卫生质量，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险制度中最主要问题——统筹层次低的问题。公立医院改革又是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核心。开啃养老和医疗改革中最硬的这两块骨头，意味着社保关键领域



改革有望在今年迎来较大突破。

收入及社保待遇水平再涨

社会保障政策在确保收入稳定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提高居民收

入水平。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自2005年我国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以来，养老金将实现14连涨。“养老金指数化增长是养老金制度设计中应有之义。考虑到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在6%-7%之间，社会平均工资将上调，养老金也会相应有所上调。”郑秉文说。

医保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出资和保障水平相对还比较低，人民群众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华表示，开展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于大病患者发生的高昂医疗费用给予保障。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特别是一半用于大病保险，将进一步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覆盖率，对于提高老百姓的就医率、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深化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今年将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对此，郑秉文表示，统筹层次低是养老保险制度中最主要的问题，很多其他问题都是由此派生

出来的,设立调剂金制度是一个过渡,建议设置过渡期的时间表。“实现全国统筹的时间越早,改革阻力就越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郑功成指出,全国人大内司委对养老保障问题开展了三年监督工作。期间形成了包括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加快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五个专题报告,并且上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医养结合是养老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是高龄老人,越需要医养结合。”郑秉文分析称,最能体现医养结合的是机构养老,其次是社区养老,再次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绝大部分是市场化、商品化的,需要提供优质的服务来吸引顾客,自然而然就能将医疗带入。

不过,郑秉文也表示,目前机构养老方面仍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是离家近的、一般性的养老院,顶端养老院主要针对高职、高管、高干三高人员,养老院需要在供给方实现多元化,适合整个市场多层次需求。此外,还要完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形成有效的竞争市场。”

医疗改革多点开花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把基层医院和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全部纳入。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分级诊疗。2018年是我国异地就医结算的落地年,也是医改的重要发力点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此前表示,根据农民工和双创人员的就业特点和就医需求,人社部通过简化备案流程、扩大基层医疗机构联网服务,至少每一个区县都有一家医疗机构能够联网,并且建立快速发放社保卡机制,满足农民工和双创人员的

就医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提高医疗卫生质量,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一块硬骨头。在代表和委员看来,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核心是医院,抓住公立医院改革就等于抓住了医改的牛鼻子。近年来有些地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已取得一些成效,下一阶段仍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勤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政府宏观治理、医院法人治理和医院内部管理三方面机制。必须多部门联动,改革才能实现突破。

在郑秉文看来,在医疗、医药与医保的“三医联动”中,医保可以起到切入点的作用。“对医疗质量实施监督、建立问责制、实施战略采购、控制费用上涨等,所有这些医改中的重要领域,医保都可以也应该发挥一定的杠杆作用。”

不过,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面临一些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玉村指出,一是有限度的财力投入和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评价和个体感受有差异。三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他建议,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让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来得更快、更彻底一些。“目前全科医生社会认同度不高,岗位吸引力弱。基层全科医生更是人员少、工作强度大、待遇较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有利于全科医生队伍的壮大。”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院长华树成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改革基层人才职称的评定办法,逐步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收入待遇,实施一些像“县管乡用”这样的人才政策,促使人才在贫困地区、在基层能够留下来,能够安心工作。

(2018-03-14 经济参考报)

教育改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仍需攻坚克难

谈及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两道“考题”的比喻深入人心。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谈道，现在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有两道考题：一道考题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另一道考题是解决好教育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每一个孩子享有优质而又公平的教育。



两道考题：一道致力于未来，关乎目标方向；一道立足当下，关乎攻坚克难。两道考题与每个孩子有关，也与教育领域的每一位工作者息息相关。

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

牵住“顽疾”“痼疾”的“牛鼻子”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作为民生之本，受到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会场内外普遍关切的话题。两会上的“部长通道”“代表通道”“委员通道”以及记者会和小组

讨论，也传递出了很多事关教育改革发展的好声音、好观点、好讯息，为两会后教育事业注入信心。

两会首场“部长通道”，陈宝生部长聚焦的首个问题，就是课后“三点半”难题和与之相关的校外机构补课乱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三点半”难题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困扰很多家庭的现实难题，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在内的多地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力求切实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但随着探索的逐渐深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打开思路，跨部门解决政策掣肘，成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为此，陈宝生指出，延长老师工作时间涉及的成本如何分担，涉及的相应劳动法律法规如何协调，都是下一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同样被牵住“牛鼻子”的还有“老大难”问题：学生课外负担过重。今年两会，“减负”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和委员们都普遍达成这样的共识：尽管近些年来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刀切”的量化规定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地区、校际间的现实差距；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突出，各类“辅导班”“培优班”让家长“爱恨交加”，教师、家长特别是学生的“减负”获得感还不强等。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辅导班”成了一些家长的无奈选择。其次，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定位不够清晰,越来越多的目标被加给学校和学生,越来越多的内容要“进校园”“进课堂”。此外,目前,为满足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建设的需要,教师在大纲规定的学科课程外,还要开发各种实践课程、综合课程,课程体系膨胀过快、种类过多,加之学科之间、学段之间、教师之间缺少衔接整合,动手实践、创意制作、考察调研、亲子合作等新的作业形式与日俱增,叠加起来就成了较重的负担。

如何解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建议:首先要强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同时要规范课程设置、深化评价改革,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负”“四则运算”。“加法”,是把孩子的睡眠和运动时间加上去,把亲近自然和兴趣爱好加上去;“减法”,是严控课内外作业的数量、种类、形式、难度,把不必要的负担减下来;“乘法”,是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除法”,是将违规的校外补课、办班,以及各种违反学生成长规律的比赛坚决去除。此外,要着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实现教育主阵地的内涵式“减负”。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宣传“基础教育为人生发展奠基”的价值取向,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效衔接,三方互为补充、良性互助,在“减负”问题上形成合力。

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如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的问题。科技强才能国家强、只有基础强才能科技强,高等教育如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吸引更多人才“板凳坐得十年冷”,沉潜下来投身基础研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认为,基础研究不仅仅是创新驱动

发展的源头,也有可能成为短板,因为基础研究有三个特点:人才培养的周期长,不能拔苗助长;从基础研究到经济社会应用的链条长,很难用短期的绩效来评估;基础研究的探索性、可预见性差。因此,不能按照设定的计划来发展基础研究,要长期和稳定呵护基础研究的发展。

针对最攸关教育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陈宝生部长直言:“当前摆在我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提高教师地位、荣誉感,让教师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为此,他提出“一提、二改、三育、四用、五保、六尊”,提出通过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改革教师编制配备制度及教师准入和离职制度,给老师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号召全社会提倡尊师重教等方式切实提高教师地位。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还需要更多教师尊重教育规律,投入饱满的热情和爱心。“我们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孩子。”王欢谈到,在小学阶段,孩子就像一颗正在萌发的种子,小学老师就要精心地呵护好这颗种子,让这颗种子尽可能的饱满,充满生命的能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好老师一定会关注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把孩子当作孩子看。

“当前,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任务又等不得、慢不得,这就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用智慧和行动回答好新时代教育事业面临的‘考题’,给出让人民满意的答案。”许多代表和委员表示。

(2018-3-22 财经头条)



税制改革：关于房地产税的三个关键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房地产税的话题又进入热议。那么，对于这个一举一动高度牵动人心的税种，今年全国两会传达出哪些新动向呢？



问题一：房地产税会不会收？

相比去年较模糊的状况，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年两会期间实际已经揭晓。3月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张业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正在加快进行起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问题的论证、内部征求意见等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提请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准备工作。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在向大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这是自2013年中央提出对房地产税进行立法后，“房地产税”第二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距上一次已时隔4年。3月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记者会，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这些“重量级”的表态，无一例外地传达出，房地产税一定会收。

问题二：房地产税什么时候收？

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不像前一个问题那么明确，但从今年全国两会透露出的信息中，也可初步一窥端倪。按照通常立法程序所需时间来推测，由于房地产税立法工作尚在初审准备阶段，有些专家预计，房地产税立法完成可能要在2020年左右；财经评论员叶檀则认为，“通过一审二审三审，最少也要四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022年。其实，无论2020年还是2022年，都还只是最快情况下的推测。实际上，很多复杂性较高的立法工作耗时之久远超预期。譬如物权法，该部法律从1993年起开始起草后，先后经过7次审议，直到2007年才最终通过，这创下了我国立法史上的纪录。

房地产税的复杂性、敏感性人尽皆知，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表述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适时”、“稳妥”与“加快”并不矛盾。那么，究

竟什么时候才是积极稳妥下的“适时”呢？越是重大的政策变化，就越需要考察前提条件的完备情况。房地产税的开征条件按难度及所需时间来排序，从低到高依次有三个最主要的观察项：

一是全国不动产统一登记。这是全面开征房地产税必须具备的技术条件。按照要求，2017年底前，不动产统一登记技术平台必须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市县。预计这项工作虽然难度不小，但距最终完成应该已不会太久。

二是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这个条件目前看来可能至少还需要至少三年左右，因为即使在2016年“930新政”后，一、二线城市房价基本趋于稳定，但仍有一大批三、四线城市房价“逆势”快速上涨。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分化格局未变，一线以及强二线城市住房供给不足矛盾仍较突出，而全国商品房总体仍面临“去库存”重任。因此，这种供求基本面状况决定了我国房地产市场至少在未来短期内，仍将受困于内在稳定性不足的困扰。

三是土地财政依赖性显著下降。这是目前横亘在房地产税面前最大的阻碍因素，因为中国与其他普遍开征房地产税的经济体相比，很明显的差异之一就是，房地产投资与消费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中的重要程度高出太多太多，与房地产相关的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巨大。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内在稳定性依然不足，同时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哪怕一次较为完整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周期，因此，这就使得预判房地产税这一新增变量，可能引出的连锁反应究竟如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是再反观地方政府目前从房地产市场中

“实实在在”获得的收入：2017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长40.7%，达到52059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预计总收入可达到7万-8万亿元。因此，房地产税的“适时”推出，必须纳入到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整体进程中去进行考量。这个过程值得期待，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问题三：房地产税怎么收？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前述记者会上透露的信息值得关注。他表示，房地产税作为一个世界通行的税种，有一些共性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1、按照评估值征税；2、都有一些税收优惠；3、收入归属于地方政府；4、需要建立完备的税收征管模式。这四点可供参考的制度安排，加上财政部部长肖捷去年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提出的“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总体思路，未来房地产税的大致框架其实已浮出水面。

如果再参照上海和重庆2011年起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情况，不难看出，前述框架实际已部分“先试先行”。譬如在征收对象上，上海和重庆都给出了较宽松的豁免条件，其中上海还可以享受人均60平方米的免税面积，重庆可以享受100平方米高档住宅（含独栋别墅）的免税面积；在适应税率上，上海为0.4%和0.6%两档，重庆为0.5%、1%和1.2%三档，两地税率都相对中性。

熟知中国改革历史者不会忘记，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先试点，后铺开”，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最常采用的成功范式。因此，基于以往经验及目前所获信息，预计“沪渝版本”（尤其是上海的版本）在很大概率上，将成为未来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参考蓝本。

（2018-3-8 侠客岛）



国务院机构改革： 一场前所未有的整合

3月17日，备受瞩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简称《方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获表决通过，标志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第八次政府机构改革序幕由此拉开。根据《方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等一系列新机构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视野中，而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三峡办、银监会、保监会等将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后，国务院除办公厅外，设置组成部门26个，现有正、副部级机构分别减少8个和7个。



这次机构改革被认为是近2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外界此前的预期。上次如此宏大的机构改革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中国政府裁撤、合并了很多部委。自上世纪70年代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至今已进行了7次机构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两会期间表示，“（这次改革）涉及的范围之广，职能调整之深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15张新面孔

在这轮机构改革中，一批新组建的机构首次亮相，包括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和8个国务院其他机构。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被认为是《方案》中最出乎意料的改革。尽管，之前中共十九大已经明确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但这一机构甫一面世，行政级别就如此之高，仍超出了外界的普遍预期。

国务院组成部门不同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其部门的成立及“一把手”的任免，都需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地位不同一般。中国以往的退役军人管理职责比较分散，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由军委参谋部和民政部负责，民政部设有优抚安置局；而军官安置则由军委政治部、人社部负责，在人社部设立了军官转业安置司。此外，国务院还成立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人社部军官转业安置司。根据《方案》，新组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对民政部的退役军人优

抚安置职责,人社部的军官转业安置职责,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有关职责进行整合,统一负责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分析认为,此举将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由于多头管理,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待遇保障等方面所积压的历史“欠账”。

在这次新组建的部委中,除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另一个全新的部门是应急管理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职能空前广泛的新机构。根据《方案》,组建后的应急管理部集中了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土部等13个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和救灾的职责,统一协调管理消防、地震、森林防火、矿难救援等所有突发自然灾害及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理。这也是此次机构改革中涉及机构最多的一项改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方案》还提出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理。此举,更强化了这一超级机构作为国家总救援队的形象。



退役军人事务部是新组建的机构之一。图/中新

在国务院其他机构中,也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面孔,比如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国家移民管理局。这些机构的相同之处是,之前负责管理相关职责的机构分散在各部委之中,级别比较低,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近些年相关职责的重要性突显出来。所以,这次改革专门成立了新的机构,对原有职责进行升级管理。国家移民管理局是发达国家

的“标配”。以前,中国负责这项事务的机构只是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局级单位——出入境管理局,业务也仅限于出入境管理。新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虽然仍由公安部管理,但级别、权限较之前有了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新机构将更好地应对日益增长的移民管理服务需求。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则整合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的有关职责和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的职责。国务委员王勇在向全国人大作说明时说,设立这个机构是为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一带一路”倡议。分析认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设立有助于结束中国“援外破碎化”的格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已超过3000亿美元,仅次于世界第一大捐助国——美国。

多部门合而为一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还对一些设置重叠、职能交叉的机构进行了整合,体现了协同高效的统筹思路。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新机构整合的三个正部级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职能上有诸多相近之处,此前,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多头执法的局面。

譬如一个饭馆,就需要分别向工商、质检、食品监管等不同部门申报、接受检查,不仅推高执法成本,也加重企业负担。多年来,各界一直有合并之声。之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类似改革,如深圳市就设有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方案》,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统管工商、质检、食品、药品、价格监督等职责,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推进综合监管执法,让民众对产品质量更放心。

类似的合并,也体现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组建中。这一机构将林业和草原的监管职能合到一起。过去,草原和林业分别由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

各自管理。但草原与森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完全分开，所以这两个部门经常为此“打架”。比如，在北方防治沙尘暴时，有些地区到底是植树还是种草，双方就长期相持不下。主管草原的农业部主张植草，主管林业的国家林业局则倾向于种树。当达成“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共识后，双方又对“灌木到底是树还是草”产生了分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组建，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另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还整合了国土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部分职责，终结了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长期存在的多头管理现象。中国有望在不久出现比肩美国黄石公园的国家公园。

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则终结了人社部、国家卫计委对“三险”分治的局面。此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人社部负责，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由国家卫计委负责。“三险合一”的目标，早在几年前就已提出，但由于双方在哪个部门主导这个问题上相持不下，至今没有落地。这次，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组建也将最终解决这一遗留问题。

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可能是这次机构改革中最受关注的改革举措。这被认为是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以来，金融监管领域最大的改革动作。改革后，中国金融业将形成“一行两会”的新监管框架。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主要是为了填补此前两者在监管范围上形成的空白地带。中国以往根据不同业态，分别用不同机构来监管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另外央行也有金融监管职能。由于四个机构横向联系弱，钻规定漏洞的金融衍生产品增多，金融市场风险加剧。这次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主管部门实施整合，就是为了防范漏洞。

“小国务院” 瘦身

在这轮机构改革中，随着一批新机构的产生，一些部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比如国务院法制办、

国务院三峡办、银监会、保监会等。据统计，国务院不再保留的组成部门有国土部、环保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卫计委和监察部等6个部委，撤销的办事机构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国务委员王勇在向全国人大作说明时说，考虑到三峡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已经竣工，方案提出，将这两个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入水利部。

“这次改革若连三峡办都不改的话，那还能改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聂卫国在两会期间表示，对于撤销三峡办，“我早做好了思想准备”。

另外，还有一些部委在此次改革中职能有所弱化。比如，城乡规划管理职责划给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后，外界普遍认为，住建部的权力被削弱。不过，在这轮改革中“瘦身”最多的还是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

根据《方案》，国家发改委多项“含金量”较高的职能被划归其他部门。比如，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并入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并入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农业投资项目将整合并入农业农村部；重大项目稽察划入审计署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国家发改委而言，这次改革的力度非常大，这轮改革之后，它的职能将大大减少。此前按照规定，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项目涉及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投资等各个领域。舆论一直对其职能范围过大，与其他部委存在交叉多有议论。汪玉凯认为，通过这轮机构调整，国家发改委与其他部委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将会得到明显改善。“今后，国家发改委将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2018-03-22 中国新闻周刊)

中美贸易摩擦的“面子和里子”

近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尽管还要履行必要的程序，但中美贸易战已箭在弦上。对中美贸易战背景和趋势的研判并采取相应的应对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事关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大局。美国率先发动贸易战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其目的也并非针对由来已久的贸易逆差，而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举措之一。



中美贸易战不是孤立存在的

中美贸易逆差由来已久，全球失衡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301 调查”也是美国常用的工具，美国挑起贸易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背景。

首先，从中美关系角度看，中美关系越来越被解构成全面的竞争关系，2017年美国把中国定位于“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对中国“赶超”心生惧怕。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话语体系中，中美比较

和竞争逐渐成为讨论中美关系问题的主基调。中国持续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正在改变中美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通过集成创新在一些领域处于领跑地位，十九大以来提出的宏伟发展蓝图，更加重了美国对中国实现“赶超”的恐惧和担心。

第二，从美国自身情况看，美国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仍然凸出。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失衡并未根本缓解，美国通过减税等改革争取跨国公司回流和发展制造业等措施效果不显著。美国负债消费模式内在的脆弱性和自身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美国对自身能否持续保持优势地位心存担忧。

第三，从中国方面看，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推动石油人民币等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努力，使美国发展模式赖以生存的国际体系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冲击，美国感到惴惴不安。

第四，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差异巨大，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汇率、“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意图产生困惑、担忧和深刻误解，造成美国国内政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误判。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故事和中国自信的过分解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误导的作用。

中美贸易战打的不是贸易逆差，是科技和知识产权

从美国对中国加税的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制造 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些领域并非是美中逆差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端技术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则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在 2016 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中，民用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占比 13%，乘用车 8%，半导体 5%，工业设备 4%，塑料材料、木质纸浆、医疗设备都占 3% 左右，大豆也高达 12%。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提高关税的目的是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的就业，但是从美国加税的领域看，贸易战的目的恐怕并不在于减逆差和增加就业，而是出于对中国科技和创新能力提升的担忧，对中国新兴产业进行遏制。至于减少顺差和增加就业等说辞更多地是选举政治下对部分选民的安抚，也为年底的中期选举做个铺垫。

美国之所以没有痛下决心拿逆差主要来源的领域开刀，一方面说明特朗普政府十分清楚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问题，美国在贸易逆差→资本流入→对外投资的国际收支循环中实际是受益的一方。而且美国逆差最主要来源的机电产品等主要是富士康在内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布点，加工贸易比重超过一半，在国际产业链中留在我过加工环节的附加值不高。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合作发展到今天，除了高技术领域外，基本上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也担心大幅度提高关税会影响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利益，并真实地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居民的福利，招致企业和广大民众的反对。从美国政府各部门对特朗普签署备忘录的反应看，大家叫好时提及最多的也是针对知识产权问题。

中美贸易战短期对双方经济影响不大

根据目前中美加税的领域和力度看，贸易战对

中美双方影响并不大。按照美国公布的钢铝加税方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钢涉及金额约 9 亿美元，加征税率 25%，铝涉及金额 18 亿美元左右，加征税率 10%。2017 年中国对美制造业出口约 5000 亿美元，约占中国出口的 20%，而按照公布的 600 亿美元高技术出口产品加税 20% 的方案，对中国出口的总体影响不大。

未来除了贸易战的“明争”，还会有更多“暗斗”，美国可能将针对中国使用市场准入、投资安全审查、排“中”性区域合作等多元战略组合，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和战略遏制。其中，退出 TPP 并主导“印太战略”也是美国从地缘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全面防范中国的战略举措。

对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措施的建议

首先，就美发动贸易战向 WTO 起诉。在多边场合和机制框架下阐明中国维护多边自由贸易规则的立场和主张，谴责美国依据国内法律对他国实施单边贸易保护的错误做法，阐明这种做法极大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也对两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第二，制定反制清单和谈判清单。不急于采取反制行动，但要研究反制清单，评估对美国汽车、飞机、大豆等产品加征关税的影响，评估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对美制裁的可行性。准备谈判清单，预估美国的要价，根据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现实需要，在扩大服务贸易开放、降低关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提高透明度等方面研究可行措施，争取尽快展开对话和谈判，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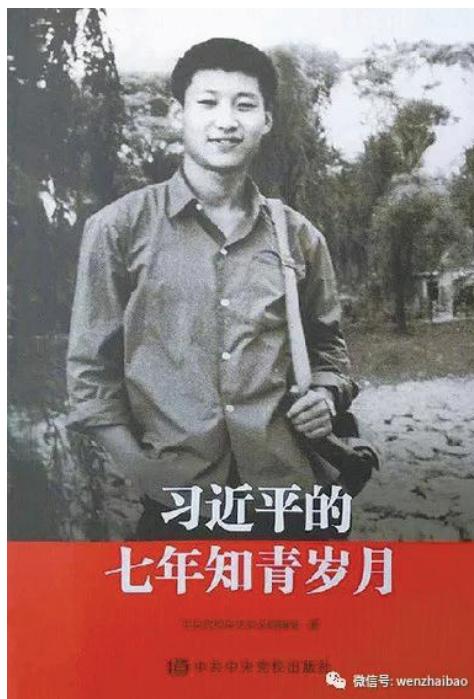
第三，针对美国加税领域，分领域进行影响评估，提出化解之策。从长计议，研究自由贸易区的中国模式，为全球贸易新规则贡献中国智慧。继续完善自由贸易区网络，可以以中美谈判为契机启动中美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

(2018-3-27 中新经纬 APP)

“崭崭头角露峥嵘”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我两次从省城到外地基层挂职锻炼，但都没有出省，持续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三年。怀着寻找榜样的心情，为了觅到真正的标杆，同时也为了更加深刻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其源头活水，我最近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深感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不嫌池水浅

习近平去插队时，不满16周岁，从首都一下到了陕西的偏远农村，虽然他性格坚毅，宠辱不惊，但平心而论，内心的落差肯定还是有的，可他很快调整过来，适应了当地的生活。那时交通非常不便，那批知青先坐火车到铜川，然后换乘卡车去延安，再坐车去延川文安驿公社，接着步行前往梁家河大队，真的是钻进了山沟沟里。面对童山秃岭，同去插队的雷平生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贫困的地区和农民？”习近平没有花很多时间感怀，更没有沉湎于对大城市的回忆，而是迅速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其实应该还有“厕所关”“洗澡关”），学着说延川话，成了一个梁家河人。他从来不觉得那个小山村委屈了他，从不觉得那里不够施展抱负，从没有尽快离开的念头。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的雷平生回忆，1973年他与习近平谈及上大学的事情，习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雷平生说未来变数很大，习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两年后，习近平被批准上大学，乡亲们送他时，他又说：“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

他很少考虑距离“中心”的远近，所处“平台”的高低、“舞台”的大小，只是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沉潜到艰苦生活的深处，透视黄土高坡的底色，触摸最真

实的大地。

山河靠后生

习近平是同批去延川县插队知青中最小的。无论是实际年龄,还是在当地乡亲的眼中和嘴里,他都是一个“后生”。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后生”,在延川县做出了很多成绩,其中不少还是开创性的,其开阔的视野、长远的眼光展露无疑。

1973年,习近平被延川县委抽调到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分配至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蹲点。虽然只有8个多月时间,但他快速行动,先是“三顾茅庐”,邀请精明能干又有闯劲和经验的武刚文(小名“随娃”)出山,重任生产队长;接着组织群众筑土坝,修梯田,栽树苗,还自己动手翻修公共厕所,将一个“上厕所的人在里面,听见外面有人来了,就咳嗽一声”的男女合用茅厕,建成了赵家河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砖石结构厕所。

社教结束后,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书。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组织了很多经济实体,新建了不少基础设施,还办了扫盲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梁家河的面貌。譬如,他成立了缝纫社、代销店、铁业社,实现了一定的专业分工,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思路,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又提高了劳动效率。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也需要准确地把握微观经济运行的规律,顺势而为。

久有凌云志

习近平在梁家河时曾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为此,他一方面深入全面地接触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与他们朝夕相处,唠嗑交流,精读乡土中国和基层政治这本无字大书,另一方面,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地博览群书,从而抛弃了以前的心理预设,摆脱了下乡知青的认识局限,跳出了梁家河的小视角,站在新的高度审视历史的洪流和发展的长河。

在这本书中,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习近平的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他拎着两个箱子,帮他一提,发现特别重;去窑洞,

又见他的桌子上、炕上都是书,才明白他的箱子里原来装的大部分是书,其中不乏《汉语辞典》《新编新知识辞典》等工具书。劳累了一天,晚餐后别人往往倒头就睡,而他则就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读到深夜,早上起来人们常常看到他的脸被熏得乌黑。去县城,他也用挎包把书随身带着,为了借一本《浮士德》,他走了三十几里路。别的知青收到家里寄过来的包裹里主要是衣服和食品,他的包裹里大部分是书。

初来赤子心

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习近平生来的勤劳与骨子里的纯朴善良。据梁家河村民武晖回忆,打井时,习近平就跳到井里,站在冰水里挖泥巴、石头。平时劳作时,有村民看他是大城市来的,年纪又小,劝他歇一会儿再干,他从不罢手,而总是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1975年采访过习近平的曹溪谷说,梁家河的沼气池后来有了裂缝,“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当地人对习近平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梁家河当时有个小名叫灵娃的孩子,智力发育有点迟缓,但是习近平对其从不嫌弃、取笑。有时灵娃从他手中抢烟卷,他也是一笑置之,从不怒形于色。1975年10月,习近平上大学前,又把50斤粮票给了家境贫寒的当地干部。县里给习近平奖了一辆摩托车,他将其换成了拖拉机等农机具给村上用。在乡亲们眼中,他还是当年的“好后生”,不会“变脸”,更不会“变心”。

在这本书里,我发现了一只鸣声清越的雏凤,一棵注定会长成千尺的新松,一种堪为青年楷模的人格与精神。

(2018-2-24 文摘报 文/甘正气)

毛泽东当年如何主导中美关系进程

近期中美关系的动向以及从美国传来的各种信息表明,这不是认识上误判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对我们进行一种试探,也是一种斗争的方式,他们能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是要看看我们如何回应的态度再作打算的。那么,究竟怎样认识美国执政者的这些言和行?这其实是美国霸权主义者色厉内荏的表现,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当年如何回应他们种种挑衅的,还是可以作为今天有益的借鉴。

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美苏冷战时期,中苏之间分歧愈演愈烈,到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而美国在越南战争陷于泥坑,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尼克松执政时,希望利用中苏矛盾,同时从越南战场脱身,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美国不得不有求于中国。于是在1972年才有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尼克松访华,才有那一年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

这个公报就是中美关系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那么有了这份中美两国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美关系就万事大吉了吗?事物总是不断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有矛盾,有斗争,也有妥协,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一些变化而已,不说长远,七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就是如此走过来的。这份公报是1972年2月29日签署的,我们不妨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看一看那个时期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及世界形

势和矛盾发展的论述,这可以启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一行又一次来华访问,周恩来同基辛格就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中间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并召集了一次与周恩来等一起讨论,24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一致认为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议论了一次国际形势,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想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真要打就不搞演习。”

所以从毛泽东这个估计,美国所以要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利用中苏矛盾,借以牵制苏联罢了。我们改善中美关系的目的,在那时条件下,是为了尽量避免两面作战。说到底,大家还不是都想坐山观虎斗,看谁的技巧更高明一些。这是毛泽东当时对

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这个判断下处理国际关系，毛主席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和所作战略选择，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当然美国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2月15—19日，基辛格访问中国，15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开会，16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住处听周恩来汇报会谈情况。2月17日，晚11点35分至次日晨1时15分，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在座。（按：仔细分析，可以知道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讲话，几乎是句句针锋相对，毛泽东已经看透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背景及其意图。）



基辛格说：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毛泽东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按：说明毛当时不相信基辛格这次来华要说的话，接着表示我们的态度。）你们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按：换一句话说，你们别在我们面前搞什么阴谋诡计，无论是明里暗里都起作用，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你们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按：燕子是战争的象征，中国有一句老话，燕子低飞，天要下雨。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可见毛泽东对于基辛格这次来华究竟为美国担负什么样的使命，是打一个问号的。）

基辛格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

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是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按：这是说中美之间的握手是有界线的，二个国家二种制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没有必要去掩饰它。）

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啊。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按：这实际上是说美苏的矛盾和斗争，便在这一条横线上展开。）基辛格说：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毛泽东说：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基辛格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我正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按：这里毛泽东把话点穿了，后来毛泽东讲过美国是踏着我们的肩膀到苏联去，然后把矛盾引向东方。可见毛泽东与美国人打交道留了一份心思，历来不相信他们嘴上说什么，而是看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谈话要把问题点穿，在国与国关系上打不得一点马虎眼，嘴巴上的漂亮话没有用。）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欧洲和你们以为这一下子可好了，总希望这股祸水到中国那里去哩。世界上的事难说啊，我们宁可这么想比较好，从坏处想。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肯定也会反对他们的。

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总统现在又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编者注。按：现在特朗普正在这样做呢。这

次美国计划开征钢铁和铝制品贸易的关税，实际上受损的主要还是加拿大和西欧那些盟国，当然，对中国也有影响，但有限。世界贸易上的矛盾还在西方，不在东方，这一点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的方针仍应是“坐山观虎斗”。中国有一句老话“损人者必害己”，所以耐心地看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怜悯的基础上，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

谈到民族包容性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基辛格说：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毛泽东说：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四年，占领大部分领土。现在我们对日本人，不要它赔偿，他们赔不起。（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也只有这样，人民之间才能由敌对变成和缓。（按：日本在安倍统治下，变得敌视中国了，日本如果沿着这条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这次基辛格访华产生的一个结果，双方互设联络处，美国在北京、中国在华盛顿分别设立，这也是美国当时处理国际斗争的需要。

1973年6月24日，《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该协议会见布鲁斯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二十日紧急约见我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正本已于六月十九日由基辛格交给黄镇），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尼克松来信，主要向我国解释美国拟同苏联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国表达反对该协定的意见的方式，不要使美国政策“复杂化”。毛泽东阅后，让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与资联合常忌斗争”（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讲联合时，不能忘了必要的斗争。毛主席这句话非常重要，从那时以来，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要与美国讲友好、

讲团结，而他非要把战略方向东移，搞印太战略。感谢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有他们的不断挑衅，才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现在有一些公知，一股劲儿想当美国的奴才，结果美国那儿对这些软骨头根本还看不上眼呢。）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二十五日会见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协定是靠不住的。（按：最近美俄在核军备上的竞争，不正是证明这些协定靠不住吗？问题还是出在美国人身上，特朗普带头重搞核军备竞赛，难怪普京要回击了）

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看过周恩来同布鲁斯谈话要点后，当晚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这才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按：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这件事，看毛泽东对2月间基辛格来访的谈话，还是把问题看得很准确。）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那么大的疆域，有那么多人口，有这么一个政党，有这么一支有革命传统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群众作基础，那是谁也奈何我们不得，这是我们坚如磐石的基础。只要我们不分裂，不迷信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谓普世价值之类的迷魂药，说实在的，谁也别想战胜我们。只要我们头脑清醒，能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稳扎稳打，那就有胜券在握的信心。在国内要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目前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混乱。在思想观念上对于霸权主义的本质，还得要有一点王熙凤讲的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识和才能才行，千万不能让他们用“文”的一手把自己冲昏了头而不再设防。所以，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前夜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几篇文章，和1972年毛泽东与基辛格几次针锋相对的谈话还是非常有益的。

（2018-3-12 乌有之乡）